



淮河、邳沟、黄河、运河与河下古镇

王福林

河下古镇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北隅,是一座有着 2500 年历史的古镇。她诞生在古淮河的滨,得益于邳沟的哺育成长,也曾遭受过黄河 455 年的侵扰,里运河的贯通,又使她发展成为一座经济昌盛、市井繁荣、人文荟萃、闻名遐迩的重镇。

本文试图从河下古镇发展的不同阶段,探讨淮河、邳沟、黄河和运河的水文化对她的影响。

一、古淮河孕育了河下古镇的诞生

淮河是我国第三大河,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北麓,自西向东流经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四省。古淮河水系,是由独流入海的淮河干流以及干流南北的许多支流组成。古淮河干流是一条河槽宽深、出路通畅、独流入海的河流。在河南和安徽境内的淮河干流,基本上是沿古淮河干流自西向东流的。在古泗州城北,古淮河由安徽进入江苏后,先向东北流,经淮阴北,自草湾急转向南,经山阳大湾再向北进入安东县(今涟水县)境,最后,在涟水县云梯关(现属响水县)入海。这就是古淮河的基本流路。

所谓山阳大湾,是指古淮河从草湾向南,经钵池山东侧南下,直抵山阳县城北,后转弯向东北到季桥,这段河床大体呈 U 字形的弯道,基本上在山阳县境,故称山阳湾。

河下古镇北临淮河,就位于山阳大湾的凹岸顶部,地理位置非常优越,有利于船舶停靠,有利于人群聚集,有利于商业发展。

淮河与长江之间的苏北平原,是一个地势平坦,湖荡密布的水网地区,大大小小的湖泊主要分布在淮河中、下游沿岸。由于湖泊是发育在冲积——淤积平原上,湖盆呈浅碟形,岸坡平缓,湖底平坦,多数湖泊平均水深不足 2 米,湖泊贮量不大,调蓄能力较差,但是非常有利于水生植物、水生动物的生长和繁殖。

河下古镇南濒湖荡,既有利于农业生产,更有利于水产业和航运业的发展。

古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,以北为暖温带季风气候,以南为亚热带季风气候。这一带气候温暖湿润,四季分明,雨量比较充沛。

河下古镇位于南北气候分界线上,是南船北马的交汇地带,适宜人群居住,有利于繁衍生息。

可见,河下古镇的水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好,这就为一个集镇的形成,提供了优越的先决条件。

河下古镇的范围并不大,最初也就是几个同族人的小村落,或者是小鱼村。山阳大湾有个小河流,叫相家湾,正是这个大湾,让淮河上往来的船舶,能够停泊,躲避风浪,上岸休息,补充给养,于是在相家湾周围的淮河水堤上就开始了商店。当时淮河以南,山阳与淮阴之间,旱路就是淮河水堤。东西往来的行人也都在此歇脚。这就孕育着一个集镇的诞生。

古淮河在苏北大地上流淌了数千年,冲积了淮河下游平原,滋润了这片沃土,养育了一代代淮水人,孕育了一方文化。

二、邳沟通淮加速了河下古镇的形成

邳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老运河,是中国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运河。

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国争强称霸。吴王夫差欲北上伐齐,于公元前 486 年~前 484 年,在长江北岸筑邳城(今扬州市),开邳沟,通江淮。以利于向北方运送军队和粮草。邳沟南起邳城以南的长江,向北绕经梁湖(今高邮附近)等一系列湖泊,折向东,入射阳湖,以较短的人工渠道相连接,航道弯曲,再向西北经山口口(今淮安城)到末口入淮河。

在春秋晚期以前,古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是隔绝的。直到开凿邳沟,这才沟通了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。

两大水系沟通后,南北船只往来频繁,淮河航运迅速增加,尤其是河下古镇北自清河口至古末口的淮河段,简直是黄金水道。在水上交通为主的农耕经济社会,百业因运而起,航运业的兴盛,带动了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和渔业等行业的发展,长江、淮河下游的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昌盛。

自邳沟通淮(前 484 年)到黄河侵泗夺淮(1128 年)的 1600 多年中,河下古镇北的古淮河经历了她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。前后经历了东周、秦帝国、汉、三国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等 10 多个朝代。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水利工程,发展农业生产,都很重视开挖疏浚河道,发展航运或者运兵运粮。

公元前 220 年,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,其中一支就由济水南岸的定陶入泗水,由泗水入淮水,再由邳沟以达大江。

公元 605 年,隋炀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,贯通漕运航道,征调 110 万人开挖通济渠,又发动淮南军民十万余人,疏浚邳沟,并将淮扬运河改道取直,自山阳至扬子(今扬州南)入江,当时称山阳渎,300 余里,渠宽 40 步。到公元 608 年,自杭州经江苏、安徽、河南到河北涿州长 5000 多里的南北大运河全线建成。公元 616 年,隋炀帝御龙舟,沿运河南下,游江都。到了唐朝(618—907 年),漕运非常兴

盛,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。甚至,大食、波斯、朝鲜、日本等国外商也来淮经商,络绎不绝。

河下古镇得益于邳沟开凿,淮河航运业的兴旺发达,南北物资的交流,使得以手工业为主的集镇,正在河下这块土地上迅速形成。

末口是邳沟的入海口,北上京都的必经之地,水上交通的十字路口。因此,她南边的山阳县,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各朝各代的统治者,纷纷在此置县、置郡、置州。

公元前 117 年,西汉武帝始建古射阳县城,公元 411 年,东晋安帝义熙七年置山阳郡,公元 581 年,隋开皇元年,置楚州,公元 625 年,唐武德八年,又改置东楚州。县、郡、州治所均设在山阳城内。

河下古镇在山阳县西北仅五里之遥,县、郡、州府的设置,对古镇的发展真是如虎添翼。

淮河水堤上随船而来的船夫和承担陆上运输任务的车夫、挑夫皆是劳苦大众,适应他们需要的各种小吃店、面店、饭店、米店、茶馆、老虎灶、理发店、洗澡堂、杂货店、钉鞋铺、早烟丝作坊、豆腐作坊、酱醋作坊等等小店铺,小作坊,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大堤两旁,并日益兴旺,这就是后来因街上有不少估衣店,而得名的“估衣街”。她东起新城西门,西至石工头,随河堤弯曲并不顺直,但她是古镇建立在淮河水堤上最早的街道。

随船而来的手艺人,来此谋生,带来了南方传统的手工艺,大大促进了古镇手工业的发展,一个个手工作坊在估衣街南侧陆续兴建。在古镇兴起的手工作坊主要有:染坊、毛巾粗中作坊、腰带作坊、绒花绢花作坊、箱柜作坊、盆桶作坊、印刷作坊、香烛作坊、鞭炮作坊、铁匠铺、铜匠铺、银匠铺、刻字铺等等。

邳沟水文化为古镇带来了作坊文化,作坊文化的发展,促进了古镇社会经济的兴旺。随着来河下谋生的人、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,估衣街南侧由东到西,直至茶巷,先后建起了八九条巷陌。为了满足山阳县与淮阴之间往来的需要,又在这些巷陌的南边开辟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通道,这就是后来的竹巷。集镇人口越来越多,集镇规模也越来越大。河下古镇在淮河和邳沟船夫的手号声中逐渐形成了。

经济社会的繁荣,促进了文化诸领域的兴盛,佛教文化、道教文化先后传播到古镇。唐朝末期,古镇上就创建了佛教“通源寺”(即现在的闻思寺),后毁于水患,宋初僧人兰孟重新修建,改名为“大悲庵”。始建于唐的“古天观”,是古镇上道教最大的观殿,是道教供奉“三官神”的殿宇,后改名为“三官殿”。

在这一历史阶段中,河下还诞生了一位我国汉初文学家——枚乘,他以善写汉赋而闻名,被誉为汉赋鼻祖,《七发》是其代表作。其子枚皋也是汉初有名的辞赋家。在我国文学史上,他父子俱负盛名。“枚皋故里”就坐落在河下莲花街萧家湖畔。

三、黄河夺淮给河下古镇带来灾难也带来机遇

南宋建炎二年(1128 年),为了阻止金兵南进,东京(今开封市)守将杜充,扒开黄河大堤,黄河侵汴河至徐州,入泗水至淮阴,由清河口入淮河。然而,没能阻止金兵南进,却给淮河下游带来了巨大灾难。绍兴五年(1134 年),黄河大决于阳武(今河南省原阳县境),主流循道南下,全面侵占淮阴以下淮河水入海道,黄河主流夺淮,这是黄河第四次大改道。

从此以后,河下古镇北边的淮河水入海道,不仅要承担自西而来的淮河水东流,而且要承担自北而来的黄河水泄。一河承担两河之水,经常泛滥成灾。加之淮河中游水系也频遭黄河扰乱,水灾为害就更为频繁。

从南宋建炎二年(1128 年)到明永乐十三年(1415 年)的 287 年中,由于元代统治者开辟海运航线运粮,运河航运渐少,加之不重视治水,水旱灾害较多,仅在至元十六年到至正二十八年(即 1279—1368 年)的 89 年中,黄河就泛滥决溢达 38 次之多。

到了明朝,统治者对兴修水利,发展漕运非常重视。决定将粮赋仍以漕运为主,江、浙漕粮专行运河经淮安末口北上。并将大运河总称为漕河。

黄河夺淮后,黄淮合流,水量增大,古镇北的山阳湾水势湍急,风涛急,不宜漕舟行驶,溯流而上,漕船损失较大。为避开山阳湾风涛之险,确保漕运安全,于是在山阳湾南岸修筑水利工程。明洪武元年到三年(1368—1370 年),淮安知府姚斌,于新城东门柳淮关(即下关),建筑了仁字坝,以新粮、货运转,车盘入淮。明永乐二年(1404 年),平江伯陈瑄,又建造了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,在新城东北角建造了礼字坝、智字坝和信字坝,三坝相连,车盘入淮。五坝既是防洪护岸工程,又是转运码头。当时漕运总督府还规定,官民商船北上,不再过坝,而分别从不同的坝口盘坝过淮,起旱车运至清口,再由水运北上。漕船由新城东门外的仁、义二坝入淮,是民船由西门外的礼、智、信三坝入淮。

这一规定给河下古镇带来了繁荣机遇,从

礼、智、信三坝卸载的货物,经车载或人担,从估衣街最东头的新城西门外苹果桥,沿估衣街过石工头,出西围门沿淮河水堤运至清口。估衣街上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,一片繁华景象。估衣街成了古镇最早繁华的街道。

另外,明永乐七年(1409 年),陈瑄任漕运总督时,为了便于补充和修理漕船,勘定在淮安府山阳县西北运河边兴建清江造船厂(今乌沙河船厂)。造船业的兴起,又大大促进了河下手工业生产的发展,成为漕船零部件加工基地,钉铁巷、竹巷、打铜巷、摇绳巷、小绳巷、扁担巷、风箱巷、夹板箱巷等等,皆因当时营造漕船商品而得名。

在这一历史阶段中,河下古镇的儒学发展很快,元朝时,山阳县儒学就设在河下,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入县城。

四、里运河贯通使河下古镇步入漕运行列

明永乐十年(1412 年),当时江南漕舟北上京都,批准安新城(即北辰镇)后,都要经陆运过坝度淮(安),逾淮(安)到达清河口再由水路北上。船只盘坝过淮,不仅效率不高,而且费事、费时、费力,劳费甚巨,船只损坏严重,平江伯陈瑄因此深为忧虑。他走访当地老人得知:淮安城西管家湖,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二十里,宜凿为河,引湖水通漕运。他采纳了老人的建议,遂发军民开河,循宋代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,由淮安城西管家湖,向西北至淮河鸭陈口,凿河(疏浚故沙河)二十里,导湖水入鸭陈口进入淮河,与北岸的清河口相对,新河称之为清江浦。随后,他再次西移邳沟,使得从扬州经邵伯、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到清河口的里运河于永乐十三年(1415 年)全线贯通。

里运河贯通后,南北行驶的船只,包括漕运的粮船,不再经末口入淮河,免去了山阳湾的风涛之患,免去了陆上转运,节省了时间和费用。不但结束了漕船在末口盘坝过淮的历史,而且大大缩短了漕船在淮河中逆水行驶的路程,使漕运更加便利安全,推动了漕运的发展。

漕船和官民商船不再经邳沟入黄淮海,除仁、义二坝尚有淮盐转运任务外,礼、智、信三坝不再有货物转运,使得估衣街的繁华景象有所冷落。但估衣街仍以她独特的产业经济,和领先的产业地位,一直保持着兴旺和昌盛。估衣街上的估衣店、铁匠铺、铜匠铺、粗手巾作坊、硬腰带作坊、早烟丝作坊等是河下其它街道上所有或很少有的,甚至木盆木桶作坊在周围县乡也是没有的。

里运河就在河下古镇南缘的管家湖,随着贯通,湖嘴码头、中街码头航运业的兴起,又给河下古镇注入了勃勃生机,估衣街和湖嘴大街的先后昌盛,带动了整个河下的繁荣。鼎盛时有“扬州千载繁华景,移西到湖嘴”之美誉。

漕船和官民商船在此停靠,南北方的物资在此交流,河下的土特产、手工业产品也可以南下苏杭,北上京都。此时的河下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埠。

从明永乐十三年(1415 年)清江浦开凿到明万历十一年(1583 年)黄河草湾改道的 168 年后,随着河下经济的不断发展,人口也迅速增加,越来越多有识之士,纷纷来此落户,一些文人学士也来此办学。

我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吴承恩先生(1501—1582 年),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,随祖辈从祖籍安徽桐城高岗(今枞阳县雨坛乡高岗),迁徙到淮安府的,居住在河下粉章巷内的曲巷尾。他出生在一个由官学沦落为商人的家庭,家境清贫。他自幼聪明过人,“性敏而多慧,博览群书,为诗文下笔立成。”“但科考不利,至中年才补上“岁贡生”。他在河下编著的《西游记》享誉全球。

在这个历史阶段中,河下古镇还出了一位状元沈坤(1507 年—1560 年),他是明朝嘉靖钦赐状元及第,是明朝淮安历史上第一位状元。他还是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,高中状元 16 年后,因母亲去世在家守孝,看到倭寇活动猖獗,便招募兵勇,组织抗倭队伍,人称“状元兵”,多次打败大举侵犯淮安的倭寇,歼敌 2000 多人。

五、盐河开发又使河下古镇成为全国盐业中心

明万历四年(1576 年),黄河泛滥,大水直冲淮安三城,为缓冲城北淮河相家湾急流,根据兵备副使舒应龙建议,由北部草湾开支流三十里,复与正河相接,截弯取直,以杀其势。

明万历十一年(1583 年),黄河再次夺草湾新河而东,漕运总督吴桂芳、兵备副使舒应龙、知府邵元哲等,于徐杨筑坝堵住黄淮主道,使其主流向南不通,迫使黄河水由新开的草湾新河(今黄淮海)流向东北,经安东(今涟水)再东行入海,使支流变成了主流。

黄河经过这次改道,淮安三城就远离黄河,恃以无恐。此时的清江浦代替了过去的末口,成为淮扬运河漕船入黄的主要口岸。

黄河自草湾改道入海后,由于此时淮阴以下的淮河水入海道已被黄河泥沙淤垫成“地上河”,加之陈瑄大修高家堰,防淮水东侵,和后来漕运总督吴桂芳、兵备副使舒应龙、知府邵元哲等,于徐杨筑坝堵住淮河主道,使得淮河

水已经不能回归故道。

河下古镇北的黄淮海故道,水缓沙停,渐渐淤塞。尚存旧河,形如旋,长 20 余里。由于山阳湾是一个 U 形大湾,主流靠凹岸,自钵池山至新城北门外,河槽较深,尚可行舟。人们利用故道里尚存的河沟河汊运送海盐,这些河沟河汊就成了“盐薪要道”,被世人称呼为盐河,河汊较小者,被呼为小盐河。在高滩上堆放海盐,河滩变成了盐场。

早在元代,世祖中统元年年至元末(1260—1368 年),淮北盐场已经兴起,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,淮城与河下已经成为北盐南销的中转站,盛极一时。

到明朝,洪武年间(1368—1399 年),两淮盐为 32000 余引,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。两淮岁入太仓余盐银 60 万两,当时全国银税总数才 120 余万两,两淮占其一半。可见,盐业的兴盛。

到清朝康熙年间(1662—1722 年),仍然是“天下盐课两淮最大”。

封建统治者为确保盐运、漕运的畅通无阻,还在河下分别设置相应的衙署,管理盐运和漕运,用以维护其统治的经济命脉。据《淮安河下志》记载,在河下这一弹丸之地,分别设有淮北盐运分司署、淮北批验盐引所、漕标右营游击署、山阳县丞、城守营之新校正副汛等 5 处衙署。

清朝统治者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,主管盐政,并分巡各盐场。沿海各地所产淮盐,全部运到河下,经检验抽税后再分运各地销售。

盐河的开发使河下古镇俨然成为全国的盐业中心,淮盐的集散地。

统治者为了确保盐运,多次疏浚河道,增加盐河水量,以利通舟。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 年),在里运河上建永利闸引水,开乌沙河沟通盐河。乾隆八年(1743 年),重建永利闸,挑浚乌沙河,挑浚鱼变河,为给盐河蓄水,抬高水位,以利盐舟,在新城西北礼字坝旁筑三孔石涵洞。乾隆十一年(1746 年),又拆去三孔石涵洞,建裕民闸由故沙河引水,分入鱼变河和盐河。

在这个历史阶段中,盐务文化得到迅速发展。大量海盐运至河下,堆放在河北岸的高滩上。卸船、搬运、堆放、分装、装船,聚集了大量盐务劳力。为便于盐河两岸往来,盐商又在盐河上建筑了“程公桥”,河北大街逐渐形成。河下古镇也因此成了北方乡镇通往县城的陆上唯一通道。

六、漕运和盐务使河下古镇进入了鼎盛时期

河下古镇独特的地理位置、优越的水环境使其成为盐务、漕运的要冲,重要的商埠,苏北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从 1415 年到 1885 年的 470 年中,是古镇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。

经济繁荣必然带动市井兴盛

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,生意鼎盛,山西、陕西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等省大批商人,纷纷来淮投足盐业,不少富商大贾还卜居于此。河下地处淮安城西北隅,仅五里之遥,大批外地盐商云集河下,特别是徽州盐商。

为了联络乡谊,进行商业交流,盐商们还在河下及其周边,建立了很多会馆,如新安会馆、福建会馆、镇江会馆、山西定阳会馆、宁波四明会馆、江宁会馆、江西会馆等。

古镇规模不断扩大,当时河下已有 108 条街巷,44 座桥梁,102 处园林,63 座牌坊,55 座祠堂。富商们的豪宅甲第连云,主要是盐商构筑,尤其是徽州程氏盐商具多。

康熙年间还改造了市面,街道由程姓徽商捐资,购条形麻石铺设而成。石板街两侧均为明清时青砖小瓦建筑,古色古香,别具风味。另外,还在估衣街上建筑了“二帝阁”,在竹巷街上建筑了“魁星楼”“文昌阁”。

经济繁荣必然带动文化兴盛。当时的河下镇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,士民殷富的集镇,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明清两朝,河下就出了 67 名进士、123 名举人、12 名翰林,有 10 余人在《明史》《清史》中有传。而且状元(沈坤)、榜眼(汪廷珍)、探花(夏曰瑚)三鼎甲齐全,历史上出生于河下、或与河下息息相关的著名人物众多。有的人任过翰林、侍郎、尚书,聘膳房总管、光禄大夫,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,其中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。

河下古镇文化底蕴十分深厚,有自己的地方志书《河下志》共 16 卷,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。

佛教文化方面,闻思寺在元、明时期由于黄河多次泛滥,大悲庵数次被洪水淹没,到了清初,寺貌才逐渐恢复如初。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 年)玄烨下江南巡视,途经淮安府河下镇,钦赐寺名为“闻思寺”。在这个历史阶段中,还兴建了湖心寺、赞真寺、广福寺、关帝庙、财神庙、火星庙等。

道教文化方面,也兴建了莲花庵、弥陀庵、药师庵、清妙观、联云道院等道观。

经济繁荣也带动了饮食业的兴盛

我国八大菜系中的淮扬名菜,明清时就兴盛于河下古镇,当时的河下,富商众多,食客云

云,所以厨艺大师们就发明了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富人的要求。如文楼餐厅的蟹黄汤包和张蛋,豪香楼的玉兰片、宴乐酒楼的长鱼宴,同一种长鱼原料,可以做出 108 道菜肴;梁红玉在淮河边抗击金兵时,鼓励士兵用以充饥的湖塘蒲儿菜,也被厨艺大师们制作成三洋蒲菜等佳肴。淮扬名菜,素有“东南第一佳味,天下之至美”之美誉,名扬海内外。

七、水环境的变化又使河下古镇逐渐衰落

清末,由于盐河水源匮乏,海盐无法运至河下,朝廷决定改由漕河出海,运河堤防冲毁,济水被迫东流,运道梗阻,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,自此漕运停止,河下古镇进一步衰落。

清同治元年(1862 年),应山(阳)盐(城)士民农田灌溉用水之需求,水利专家殷自芳建议,重建永利闸旁旧耳洞,改旧盐河为新市河,挑宽加深,仍自乌沙河引水,灌溉农田。但挽救不了河下古镇走上衰落的命运。

清光绪十一年(1885 年)山东长青等县黄河决,改由会通河出海,运河堤防冲毁,济水被迫东流,运道梗阻,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,自此漕运停止,河下古镇进一步衰落。

尽管盐务文化、漕运文化都告一段落,但里运河中的官民商船仍川流不息,商业文化在河下古镇仍旧延续,2000 年的作坊文化也在延续。所以,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,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河下古镇的社会经济,虽然没有鼎盛时期那样繁华,但仍然比较昌盛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,机械制造取代了手工操作,有些手工作坊逐渐被淘汰。新中国成立后,对广大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,手工作坊转变成了工厂。至此,河下古镇的作坊文化也画上句号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在大力发展陆上运输的同时,仍以水上运输为主,河下古镇的湖嘴码头客运业务、中街码头货运业务仍很繁忙,特别是大跃进年代,笔者目睹了河面上轮船、驳船、帆船穿梭往来的盛况,目睹了河下腌制的大头菜运往南方,本人也曾坐轮船南下镇江。虽然远远比不上漕运盛世,但毕竟是一条流动的生命线。

1959 年里运河截弯取直,大批船只都往来于运河新道,只有少量船只仍航行在里运河上。基本上给古镇的商业文化也画上句号。2011 年淮安又在老城西南的里运河上建设了防洪控制工程,这就彻底切断了与大运河的联系,从南角楼到淮阴闸口,这段里运河再也没有商船、货船往来,建设了一弯静水。

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,古镇北边的市河因没有灌溉任务,水量逐渐减少,直至干涸,加之淮(安)连(水)公路建成,“程公桥”不再是北乡人进城的唯一通道了。

古镇南面的萧湖,水域面积也逐渐缩减了近六成。

风水变了,人气没了,古镇彻底没落了。回顾河下古镇走过的 2500 年的漫长历程,都与水息息相关。

八、美化水环境使河下古镇在旅游大潮中获得新生

2006 年 5 月 25 日,国务院将河下古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纵观历史,河下古镇依水走过的辉煌历程,是值得人们研究的,古镇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,也是值得人们观赏的,开发古镇的旅游资源,是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。

现在河下古镇是淮安历史文化名城保存比较完好的历史街区,至今整个街区仍保持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,历史风貌基本保存完好。韩信钓鱼台、漂母祠、左宝贵墓、清真寺、古文楼、韩家故居等古名胜、古建筑,也保存完好。唯鼎盛时期建筑的二帝阁、文昌阁、魁星楼、状元楼、闻思寺、广福寺、赞真寺、三官殿,有的毁于战火,有的毁于动乱年代。河下的每一条街巷,每一座桥梁,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,是全国所有古镇中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的。

值得庆幸的是,淮安市和淮安区政府都很重视旅游业的发展,近年来,先后整修了湖嘴大街、花巷大街、石工头、估衣街的街面和石板路面;修建了吴承恩故居和纪念馆,猴王陈列馆;修建了吴鞠通中医馆、沈坤状元府,梁红玉祠;重建了闻思寺、程公桥。

淮安市政府还把昔日的里运河建设成为运河文化风光带,从淮阴大闸到淮安老城的南角楼,并在里运河上建设了防洪控制工程,来调节水位,以利观光事业的发展。淮安区政府又开辟了萧湖公园,进一步美化古镇周围的环境。

让优美的水环境烘托着这座千年古镇,向人们讲述她因水而生,依水成长,得水兴旺,失水悲伤的故事。河下古镇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旅游大潮的到来,她将在大潮中获得新生!

作者简介:王福林,淮安河下古镇人,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金堤河管理局局长(正司职),党组书记,教授级高工。退休后,长期住河下古镇粉章巷。